

开启未来丛书之文学作品集

高连营 主编

欲望化的都市

YUWANGHUADEDUSHI

欲望以提升热忱，
毅力以磨平高山。

.....

透过漫天飘落的樱花花瓣，用你心中的
双眼去感受这美丽的世界吧。

.....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开启未来丛书之文学作品集

欲望化的都市

主编：高连营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图数在版编目(CIP)数据

开启未来丛书之文学作品集/高连营主编,呼和浩特:内蒙古
人民出版社,2006.12

ISBN7-204-07897-7

I.开… II.高… III.文学-作品集-中国IV.136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5968 号

开启未来丛书之文学作品集

主 编 高连营

出版发行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发行电话: 010-87713181

地 址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大街祥泰大厦

印 刷 三河市燕春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275.725 印

字 数 4000 千

版 次 2006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000 册

书 号 ISBN7-204-07897-7/I·1685

定 价 1192.00 元(全 40 册)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联系 联系电话:(0471)4971562 4971659

总 序

文明的华夏，名人辈出，代代相继，千古人物。

成功、成名、成家，这是每个时代都令人向往的不倦话题。

步入这个五彩缤纷的大千世界，谁不希望成功？谁不想到成名？谁不企盼成家？21世纪的年朋友们不禁提出这样的问题：“成功从何处起步？成名的奥秘在哪里？成家的诀窍是什么？名人名家们的岁月时代是怎样度过的？”

《开启未来》丛书将回答你们的这些问题。丛书的作者引用了各界名家名人百余位，怀着眷眷深情，驾起自己回忆的小船，溯流而上，去寻觅自己难以忘怀的青春岁月，去捕捉当年智慧的闪光，去追溯自己成功、成才、成家，为民族为国家做出贡献的源头。

“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名人名家不仅创造了令人景仰的成就，而且也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他们高远的志向、顽强的意志、勤勉的精神和必胜的信念，正是今天朋友们不可缺少的心理品质。因此，了解名人过去的历史，追踪他们走过的脚印，领悟他们成功、成名、成家的内涵是十分必要的，从中一定能得到很多有益的启示和借鉴。

这些名人，他们的青春岁月，充满了苦辣酸辛，坎坷磨难或

经战火的洗礼,或历曲折的境遇,或扬逆水的风帆,或留奋斗的足迹……

在他们的人生道路上,有幸福的回忆,更有苦涩的泪水;有成功的喜悦,也有挫折的苦闷,更有失败后的反思。在名人的生活辞典里,不是没有平凡和琐屑,正是对平凡和琐屑的超越,才成就了他们的伟大和成功。

这套丛书的文字,不是这些大家名人们作流水账式的忆旧,而是在自己漫长的生活画卷上精心地撷取;也不是空洞冗长的理论说教,而是时过境迁的作者真情的流露、实感的迸发。因此读起来亲切、真实、自然,若汨汨清泉,沁人心脾。从他们的经历中,朋友们可以悟出成功的规律,做人的道理,处世的艺术,成名成家的奥秘。

老者不复返,来者永远新。我们国家正处在改革开放的伟大时代,要把我国建设成有特色的社会主义强国,今天的年朋友任重而道远。希望你们都做伟大时代的强者,做伟大事业的成功者,肩负重任,迎着风雨,用坚强的信念,将理想的太阳从心头托起,用毅力的犁铧去耕耘不辍,走向未来,走向光明,走向自己的成功之路。

成功属于我,属于你,属于他,属于这个伟大的时代。

2006年6月

目 录

导语	1
一、都市和乡村作为问题的提出	1
二、乡村与都市:作为社会和文化的两种形态	14
三、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都市与乡村	37
第一章 现代性的都市与乡村	48
一、现代派:“不真实”的城市	50
二、新写实:“真实”的城市	63
三、先锋派:形式的都市和乡村	67
四、现代性的乡村:孤独	75
第二章 中国乡村:苦难与救赎之地	90
一、反思文学中的城乡	90
二、知青:理想的土地与青春之梦	103
三、寻根:在荒野与大地之间	121
四、衰落的乡土	138

第三章 世纪末的诱惑与反抗	159
一、欲望化的都市	159
二、都市与个人化写作	173
三、乡村:精神的家园	182

导 语

一、都市和乡村作为问题的提出

把都市和乡村并列在一起研究是基于这样一个认识：都市和乡村不仅仅是地域意义和社会形态的区别，而且是文化形态和经验方式的区别。这两种异质性的经验方式给中国当代文学所带来的意义，随着社会的发展越来越明显，都市和乡村分割着中国文学的空间，并把它们自身所特有的结构形式、想像方式、组织和象征系统转化成一种文学经验。所以，我在这篇文章里所说的“都市”和“乡村”不是从题材的意义上界定的。“都市空间”和“乡村空间”也不是仅仅指一种实在的生存空间，而是指由空间场所所生成和带来的诗学空间。

当然，把都市和乡村作题材意义上的划分、研究是一种常见而普遍的方式。韦勒克、沃伦在《文学原理》里认为按题材进行文学分类“是一种社会学的分类法”。从题材角度研究文学中的都市和乡村很容易把关注点聚集在类似于主题、类型、社会形态方面，而忽略都市和乡村自身作为一个叙述文本对文学的意义。乔伊斯·卡罗尔·奥兹(Joyce Carol Oates)在《想像性的城市》里追问：“如果城市是一个文本，我们如何阅读它？”^[1]同样，可以追问：如果乡村是一个文本，我们如何阅读它？从这个意义

上说,都市和乡村都可以被看做有着自身叙述方式、话语、诗情的文本,作家阅读这个文本时,作为文本的都市和乡村终究给作家带来如何不同的审美经验呢?它们又如何渗透到作家的叙述中转化为一种独特的文学经验?我感兴趣的就是都市和乡村与人的关系,以及由于它们的变迁所带给文学空间格局的变化,以及它们不同的经验方式所给予文学的意义。

把都市和乡村作为一种差异性的存在并列起来还基于这样一个事实:中国都市自足的存在形式以及它所提供给文学的想像力和文学经验的可能性。从中国的社会现实和文学现实的空间格局来看,本世纪以来,都市越来越具有自身的品格,越来越具有文本解读的有效性。费孝通先生在30年代考察了中国社会的基本结构后写了一本著名的小册子《乡土中国》,从此以后,“乡土中国”不仅作为一种社会形态描述而且作为一种文化形态的描述也获得了称谓上的有效性和合理性。在被费孝通先生称为“乡土中国”的国度里,每一个人都与乡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生活在城市中的人,也许三代以上就是农民,这种乡土血缘注定了中国作家文本中的乡土性。而且,“乡土中国”所特有的文化传统、人文精神、想像力、乡土情怀和审美理想等形成一种独特的“乡土文本”,它自身所具有的宏大、深厚、稳定的叙述规约和限制着作家的叙述。从现在从事写作的几代作家来看,由城市提供叙述与诗情的作家是很少的,大部分作家仍是从乡土中来获取写作资源与写作经验。尽管社会形态(城市与乡村)与文学叙述的关系并不表现为直接单纯,把社会形态与文学形态置于单一的影响模式之下是不可取的,但是,中国城

市及与城市相关联的一系列品性的薄弱确实影响了文学的叙述经验与方式。正如李欧梵在谈到中国现代小说中所以说：“城市从来没有为中国现代作家提供像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彼得堡或乔伊斯在都柏林所找到的哲学体系，从来没有像支配西方现代派文学那样支配中国文学的想像力。”^[2]

中国是一个直到目前为止的农业国度，有 80% 的人口居住在农村地区。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农业经济和生存状态所支撑起来的文化，直到目前为止，这种文化还在很大的程度上。支配着中国社会的大多数观念和经验的形成和流行。农业社会这笔庞大的遗产和现实积存，使得中国在 20 世纪这个全世界都在走向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带来了一次“农村包围城市”的伟大社会变革。这次变革不仅打倒了羽翼未丰的民族资产阶级，并使都市的生活本身被严密地组织化、军事化和统一化，一时间，中国的城市不再是那种近代自然成长起来的都市了，它成了半军事化的、人口密集的生产基地。但是，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以牺牲多数的利益，特别是农民的利益，强行促使其工业化的进程。这从另外的渠道，加强了中国社会都市化的进程。等到本世纪 70 年代末、80 年代初的改革开放到来时，一眨眼功夫，中国的城市便以新的面貌出现，它们不再简单的只是一个生产基地，而且是一个贸易和消费的高度集中的区域。当配给制和半军事化组织方式解除之后，人们仿佛突然间睁开了眼睛，他们不再生活于灰色的生产车间，而是生活于流动性很强、五光十色的城市之中了。这使得那生活于城市中的人们，始有了真正的都市经验的积累。

对于中国来说，现代意义的都市的初步形成是在本世纪初。《剑桥中华民国史》的研究表明，中国“清末城市生活的特征，无论在政治方面还是经济方面，都与五百年前宋代的情况极为相似”。但是，“从19世纪中叶起，由于外国的影响在中国站住了脚。中国城市除了具有其源远流长的传统作用外，又增加了现代经济、政治和文化方面的作用”。^[3]这种变化主要是沿海“通商口岸”的城市。这里有了新的交通手段如铁路和海河航运，外资和华资所兴办的现代工业和商贸变得极为活跃，在这些城市中，还相继出现了一些新的职业领域，如各种自由职业、新闻和出版社以及现代教育和文化机构。城市中的一小部分居民除了可以在制造业和商业部门就职外，还可以在上述新的领域中选择职业。辛亥革命在废除科举制度之后，围绕着这些新型的城市，形成了独立的知识分子群体，他们作为自由职业者活跃于城市之中。这些具有现代城市雏形的城市当时主要有六个，即上海、北京、天津、广州、南京和汉口。^[4]而上海，在本世纪30年代初，已位居世界大城市的第五位，成为远东地区惟一的国际金融和贸易中心。

1949年以后，城市的发展虽然受到了来自意识形态顾虑的控制，但强行工业化进程却连续地进行了三十年。而这个工业化的进程和财富的堆积都主要集中在城市，这三十年城市的人口也大大地发展了。到1978年那强加于社会的多年限制逐渐被消除之后，那三十年所积累的东西，便一夜之间爆发出了令人难以想像的活力。在很短的几年时间里，便完成了现代城市的转型，并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深度开始了中国都市化的

进程。

90年代的中国正在加剧这种现代化的进程。现代化从某种程度上意味着都市化,所以,都市自然而然地被纳入现代性的宏伟叙述中。都市在中国社会物质价值的集聚堆积中成为一个庞然大物,它从“农村包围城市”的汪洋大海中傲然而起,向广大的乡村、各种各样的人宣布着它的迷人光彩和诱惑。它的街道、高楼、人群、车流汇聚成都市的话语,“霓虹灯”、“广告牌”、“卡拉OK”、“酒吧”、“单身俱乐部”、“舞厅迪厅”成为现代都市的符号和象征,它是新思潮、新观念、新行为的传播和流行之地,出版、广告、电视等现代传媒的制作和发散之地。1985年全国共出版书籍45603种,杂志4705种,省级以上的报纸698种;可是,到1995年书籍的数目已增到101381种,杂志7583种,省级以上报纸2089种^①。十年时间里,全国图书出版量增加了1倍多,而广告和电视更以惊人的速度增加,1985年全国广告营业额是60522万元,人均广告费0.571元,1995年全国广告营业额增加到2732690万元,人均广告费为22.562元,广告业务以几十倍的数量递增。^②广播电视的增加速度也是惊人的,1985年有广播电台213个,电视台202个,1995年增加到广播电台1202个,电视台837个。^③大众传媒建造和重构着90年代的都市空间。

现代城市及其结构形式更容易使个人游离出群体和家族的组织,而获得独立存在的可能。90年代中国的城市的组织方式和生存秩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城市成为经济和资本积累的庞大物质结构时,它也为个人提供了各种机会和想像力,城

市成为冒险家和淘金者的乐园,越来越多的人从四面八方涌向城市,这样,新中国成立后维持人口秩序的“户口制”变得非常松散,户口制度以及相应的人口流动影响制约着城市化的格局。1955年6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建立户口登记制度的指示》,规定了全国城市、集镇、乡村都要建立户口登记制度,从而统一了全国城乡的户口登记工作。全国户口登记制度建立以后,为了保证城乡居民的安定,户口开始与日常生活物资供应(粮食、食油、棉布、棉絮)直接关联起来。1958年1月制定的户口制度对流动人口的约束力很大。《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第15条规定:“公民在常住县、市以外的城市暂住3日以上的,由暂住地户或者本人在3日以内向户口登记机关申报暂住登记,离开前申报注销;暂住在旅店的,由旅店设置旅客登记簿随时登记。”第16条对流动人口在城市中居住的时间也作了规定:“公民因私事离开常住地外出、暂住的时间超过3个月的,应向户口登记机关申请延长时间或者办理迁移手续;既无理由延长时间又无迁移条件的,应当返回常住地。”我国户籍管理工作的原则是“人户一致”,从而导致某种程度上的“画地为牢”,尤其是户籍制度的继承性更加使这种“画地为牢”变得具有“永久性”:“生于此,长于此;老于此,死于此”。城市是流动人口的流点,80年代中期以后,流动人口迅速增长,90年代以后,特别是1993、1994年,流动人口的增长达到高潮。北京市1949年滞留3天以上的流动人口只有6.08万。^①1951年底1952年初,增长到13.44万,比解放初增加了1倍,^②1961年8.17万,1960年7.42万,1962年8.58万,“大跃进”、“文化大革命”中许

多城市人口迁移或流放到农村，从而产生了所谓的“人口倒流”。1976年以后，流动人口开始增加，1994年11月北京市调查外来人口为287.7万人，是1990年131万的2.21倍。90年代流动人口情况，据公安部门估计，1989年全国流动人口数为6000万左右，1991年为7000万左右；1995年为8000万左右（其中在公安机关登记的暂住人口为4400万人）。^[10]

这意味着一个人人生来注定的生存秩序遭到彻底否定，个人不再被永久地束缚在某一个地方，个人的流动性使天然的血缘一家族居住方式和人际关系开始变得面目全非。十六年前路遥的《人生》（《收获》1982年第3期）里写了一个乡村知识分子渴望进入城市的全部野心和沮丧。城市和乡村构成了高加林世界中美丽的想像和苦涩的现实，城市与乡村构成对比性的一极，城市完成了高加林的乌托邦冲动与青春欲望，是高加林从此岸到彼岸的坦途。野心勃勃的高加林把所受的屈辱化成内心的仇恨与毅力，在向城市行进的过程中完成自己的复仇行为。可是，城市又是冷酷无情的，它最终拒绝了高加林，它只是高加林一个破碎的梦，城乡之间的巨大距离使他难以跨过连接着城市和乡村之间的那座小桥。对于今天的高加林来说，城市不再是一个只提供欲望而不提供机会的空间，它在提供欲望的同时也提供着机会。人口的流动性和城市空间的开放性使独立个人的浮现有了现实的可能性。现代大都市接纳了这些似曾相识又面目不清的陌生人，为他们提供生存空间和生存机会。自由职业者、自由撰稿人、自由制片人等与现代都市及其自由组合方式的职业角色出现，作家的社会角色和历史地位发生了根本性和革命

性的改变。新一代的许多作家都不再依附于某一个单位、作协或机关,而在与现代都市的血肉相依中靠自由交换和现代流通方式确立自己作为市民的生存方式,余华、林白、陈染、王朔等作家成为真正自由的职业作家,他们不再为“作协”和“产量”要求写作,而是真正地为自己写作,也是为大众写作。

从目前的写作者来看,“右派作家”创作力渐趋衰势,文坛实力派是“知青作家”及年龄上相当于知青作家的人,这一代作家与土地的关系比较亲密。从地域角度来看,陕西、山东、山西等作家群与土地的关系最为紧固,陕西的路遥、陈忠实、贾平凹,山东的张炜、刘玉堂等,山西的李锐等;而从事形式实验、先锋写作及新生代作家群则主要聚集在北京、上海、南京、广州等大城市,北京的余华、王朔、林白、陈染、丁天、邱华栋等,上海的格非、孙甘露等,南京的苏童、韩东、朱文、鲁羊等等,作家的写作方式与其生活的地域以非常直接的关系呈现出来。亨利·詹姆斯说对居住地的选择有时具有某种象征意味,对于北京这样的大都市来说,它在 80 年代中后期到 90 年代的中国文化中有着与众不同的意义,它是新思潮、新观念、新形式的传播与流行之地,它以其自由的方式与新颖的现代观念吸引着来自各个地方的人。流浪艺术家在圆明园组成几近艺术部落的“画家村”,90 年代北京成为书籍印刷、出版的中心,全国个体书商云集北京……所以,对于那些追求现代感觉和现代形式的作家来说,北京成为理想的生活与写作之地。余华从江苏来到北京,林白从南方(广西)来到北京。与此相反陕西作家陈忠实、山东作家张炜却一次次离开喧闹的城市,去沉静的乡土寻找写作的激情

与叙述。最意味深长的是张炜和陈忠实的写作之地都是远离都市与喧嚣的乡间小屋，张炜在登州海角的小屋完成其《九月寓言》，陈忠实在西安郊区的小屋里写作《白鹿原》，对都市的涌入与背离，在中国 90 年代的作家那里不仅仅是作家身体力行的事情，而且这种身体力行直接沉浸到文本的写作与叙述中。

中国的现代都市所蕴积的现代经验必然支撑起新的叙述文本。到 1985 年，以都市经验为核心所形成的都市文本，便以新的、令人惊异的气派冲击、打破了几十年来由乡村经验支撑的文本一统文坛的局面。1985 年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徐星的《无主题变奏》、陈村的《少男少女，一共七个》，1986 年刘西鸿的《你不可改变我》、陈建功的《髻毛》等小说，以启明星般的耀眼和独异，在中国文坛上支撑起了另外一片天空。这个独异天空的支撑点便是与乡村文本的支撑点完全不同的都市经验。尽管许多评论家指出了《你别无选择》和《无主题变奏》等城市小说与西方现代派在精神上的联系，从这些小说里看出了《第二十二条军规》里的“黑色幽默”和《麦田里的守望者》里的艺术痕迹。但是，如果没有新的都市经验的积累和发展，这些外来的现代主义的东西，便无法落地和生根。马尔科姆·布雷德伯里在《现代主义的城市》里说：“19 世纪末兴起，并发展到今天的实验性现代主义文学，从许多方面来看都是城市的艺术，尤其是多语种城市的艺术。”^[1]G.M.海德表达过相似的观点：“我们可以认为现代主义文学产生于城市，而且是从波德莱尔开始的——尤其是从他发现人群意味着孤独的时候开始”^[2]；城市精神和生存状态刺激了现代主义文学的产生，而现代主义文学

又大多集中挖掘个人在现代都市里的经验和观念形态。在这种叙述空间中,城市题材获得了叙述的优势,叙述个人和都市的小说更容易获得现代感觉和生命体验。当然,城市题材本身并不必然产生现代意识,关键在于如何叙述城市,如何叙述城市中的个人的生存状态。不管怎么说,80年代中期中国真正的现代派是由对现代都市的叙述来完成的,或者说,刘索拉们小说中那些具有明显的现代意识和现代经验的叙述只能产生于现代都市中。刘索拉们的现代派小说里的异质性的经验方式标志着与乡土经验的真正断裂,也意味着一种新的叙述方式从都市经验里升起。

以都市经验支撑起的文本,打破了乡村经验支撑起的文本的一统局面,而带来文坛更复杂的经验方式。当然,这种二元的格局并非一定是对立的,在更多的情况下,它们之间处于一种差异并置的状态,但是不时地要爆发出矛盾和冲突,从而构置着中国当代文坛的戏剧性场面,构成着当代作家内心的冲突,构成着中国当代作家创作的内在驱力和限定。1985年写出《透明的红萝卜》,1986年开始其“红高粱”系列的莫言于1987年这样写道:“我无法准确地表达我对故乡那片黑土大地的复杂情感……离开故乡之后,我的肉体生存在城市的高楼大厦里,我的精神却依然徘徊激荡在高密荒凉的土地上。对高密的爱恨交织的情愫令我面对前程踌躇怅惘。”^[13]莫言的这段话其实道说的不仅是他自己内心的矛盾、冲突和苦闷,而且说出了诸多当代中国作家普遍的内心冲突和苦闷,这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都市化所导致的不可避免的结果。